编者按：本文系第六届“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2023 年 12 月）圆桌讨论的文字实录。该论坛于 2018 年由丁耘、吴新文和张广生讨论创设，旨在呼应中国崛起的现实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表明中国崛起不仅在经济上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也在文化上显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而且在政治上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23 年年底，第六届“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办，圆桌讨论的主题为“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来自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 12 位学者，对同一个问题展开了思考、探索和辩论：面对人类世界处于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旧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全球秩序尚待形成的现实，不同的国家和文明都在寻找一条出路，而处于中美竞争的相持阶段，处于“伟大斗争”的来临时刻，以及面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所寄予的希望，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究竟该怎么办？如何提高自身应对疾风骤雨、惊涛骇浪的意志和能力？如何终结旧的由美西方主导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化，并想象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式全球化？

对以上议题的深度思考和讨论，正是当代学者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体现与担当。经授权，本刊对与会学者的演讲进行了全文记录和整理，以飨读者。

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

[与会学者和嘉宾]

白　钢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丁　耘　中山大学哲学学院长聘教授
寒　竹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李　滨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李　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唐　杰　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
吴新文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殷之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张广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丁耘（圆桌讨论主持人）：

今天我准备的发言想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矛盾论，理解当代中国；与之相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重新理解矛盾论。10 年前毛主席诞辰 120 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矛盾论与政治哲学》，今天我试图重新理解矛盾论。先讲第二个问题，怎么重新理解矛盾论。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的文集《保卫马克思》中，有两篇文章直接提到毛泽东思想，一篇是《矛盾与多元决定》，另一篇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在《矛盾与多元决定》中，他给出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矛盾论的理解，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多元决定的矛盾”（“多元决定”也有翻译为“过度决定”或“超决定”，本文用的是《保卫马克思》中的中译）。

请注意，这个概括如果放到西方哲学史里，是个极了不起的概括。阿尔都塞学说的哲学背景主要是斯宾诺莎，他在斯宾诺莎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叫“多元决定”——这不是斯宾诺莎提出的术语，而是来自心理学和语言学。斯宾诺莎认为，一个样态的存在包括它的本质和实存，它存在多长时间、怎么体现，不是线条式决定的，也不是实体唯一决定的，而是多重决定的结果。但是斯宾诺莎的学说里没有“矛盾”这个概念，“矛盾”这个概念来自黑格尔，而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非常不留情面的，这也意味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式解释批判是不留情面的。阿尔都塞指出，矛盾虽然是黑格尔提出的术语，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远远不

是黑格尔讲的一个绝对的总体扬弃一个环节、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矛盾，它们都属于一个唯一总体的矛盾。阿尔都塞把“多元决定”和“矛盾”这两个有着不同哲学渊源的概念合在一起，并表示“多元决定”矛盾观的典范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矛盾论，主次要矛盾、矛盾的主次要方面及其转化不平衡，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这些概念，这是毛泽东的创造。

我这几年在斯宾诺莎的学说上花了一些功夫，当看到有人直接把斯宾诺莎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的时候，我是比较兴奋的。我以前看过《保卫马克思》不止一遍，但是都没有抓住这个点；在毛主席诞辰 130 周年这个时机，我重读文集，突然抓到了这个点。阿尔都塞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解释，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多元决定的矛盾”由两个概念合在一起：“多元决定”指这个矛盾处于一个复杂的总体当中，而“矛盾”就是指不平衡。阿尔都塞用了毛主席的话，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这回事，这就意味着矛盾永远要分主次。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既要又要还要”的存在，事情本身不是这样的。你想全部都抓，往往什么都抓不住；而这“不平衡”指事情的真相就是不平衡的，一定会自己分出主次来，而且主次会相互转化。这是形式主义和辩证法最大的区别。从西方哲学出发，我找到一个能相对方便地概括毛泽东思想的术语，即多元决定的矛盾。至于这个词是否准确，我们另外再说，因为从中国哲学史出发可以有另一套说法。

阿尔都塞的学说这两年在中国有复兴的态势，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精神译丛”系列丛书，里面有很多重要的阿尔都塞作品的中译本。阿尔都塞的学生埃蒂安·巴利巴尔很重视这事，还专门为阿尔都塞著作的中文本写了序。在该序快结束的地方有一句话——“在当今世界，中国占据着一个完全悖论的位置。”这“悖论”就是指你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但是当你走到自己反面的时候，你回到了自己。巴利巴尔在解释阿尔都塞和毛泽东思想两次相遇的时候，讲了矛盾论；但他在讲中国占据悖论性位置的时候，他讲的是现在，也就是 1980 年代以后的中国。我想我们可以思考怎么用毛泽东思想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论来看这一悖论性。这是当下对毛泽东思想仍有信心的思想者面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时，必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

我想得还不成熟，这里提两点想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进一步讨论。第一个就是要说清当前具体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多研究都提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里永远发生作用的最根本的一个矛盾。而“多元决定”的矛盾论指出，矛盾虽然归根结底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但这只是一重决定，而我们要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具体化。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里引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里的话，说上层建筑就是一系列微观事件，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上层建筑自身实际上是有矛盾的，它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相应的，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讲，不是谁决定谁，而是相互体现的。换言之，今天上层建筑的各种矛盾，如意识形态的斗争，实际上就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斗争。比如，“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某种意识形态对我们现在经济基础的一种概括。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基础中，不同的生产方式至少有三种，用老套的也许不那么准确的话说，即国家主导的企业、民族资本主导的企业以及外资主导的企业。就算我们不去这么概括它们，这矛盾依然存在，且会反映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当中，甚至会影响某些地域和城市的气质。

我想讲的第二对矛盾是内外矛盾。这矛盾实际上是呼之欲出的。我党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

头，对具体形势的总任务的把握，永远用的是矛盾论的术语。比如，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后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结合”。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式现代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代设想的很不一样，中国式现代化有一面是中国式全球化，没有中国式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我们讲“两个结合”，也蕴含了第三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全球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这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块，怎么重新叙述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体系里，给予现在的中国怎样一种定位？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其实一直在有意识地推动“走出去”，让经济、管理、组织走出去，但是文宣没有相应地跟着走出去。我们在中国式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表述。这点可能是我们在座这些人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中矛盾论的一个具体运用。“文质彬彬”是动态的，“文”和“质”是相互追赶的，要么是“质”胜了“文”，要么是“文”胜了“质”，而不是永远保持“质”胜过“文”，“文”跟上了，“质”再往前走。就像人走路一样，要么左脚在前，要么右脚在前。这是我的一些粗浅想法，希望大家批评。

王绍光：

丁耘教授讲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但他刚才谈的主要是生产关系方面。经济基础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生产力，本次学术论坛的主题叫“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我们要追问大变局的动力在哪个地方，我们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大变局，到底是什么东西变了？使我们处在新的位置上，很重要的是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00 年前，1923 年或者往前再追 50 年，1873 年，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说法，那个时候中国的 GDP 还占全球的百分之三十几，我是有点怀疑的，我觉得占不了那么高。因为到 195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低于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直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是最穷的国家，但 1950 年的时候，按人均算，我们比他们还穷。

现在我们讲出现了大变局，外国人也看到一个大变局，尤其是美国人看到一个大变局。我梳理过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直到 2010 年，他们对中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防范。美国不喜欢中国的政权是肯定的，但美国不觉得中国是很大的威胁。“中国崛起”这个词，我们现在用“崛起”好像没有很长时间，郑必坚用这个词是在 2005 年，西方人用“中国崛起”这个词，在西文里我能找得到的一个人是彼得·诺兰（Peter Nolan），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我认识他，他非常乐观。1989 年我碰到他，他都依然十分乐观，他大概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很长时间没有人觉得中国在崛起，到 2005 年以后才开始有人讲“崛起”。但那时西方讲中国崛起也不要紧，中国是按照西方的剧本（play book）在走。中国的现代化一定会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先有经济上的变革，然后有社会上的变革，最后出现政治上的变革，变得和美西方一模一样，所以没什么紧张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也没发展到一个高的水平，在 1998 年的时候，我们的 GDP 总量相当于美国的 11%，所以美国没有理由把中国看成一个威胁。

在冷战时期，处于第二位可能潜在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一个是俄罗斯，有一段时间是

日本，它们的 GDP 几乎从来没有超过美国的 25%，更不要谈达到 50% 了。结果突然有一天到 2016 年、2017 年的时候，IMF 出了一个报告，用购买力平价一计算，说今年或者明年中国 GDP 将超过美国，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说法就变了，到处都是中国崛起（China Rise）。当然，“崛起”对美西方来讲不是个好事情。然后，中国已经不按照美西方的剧本走，所以变成一个威胁。最开始说是威胁美西方在亚太地区的位置，现在说威胁它们在全球的霸权，所以大变局的中国根本在于生产力发展了。

这两天我和很多朋友交谈，大家最近有个焦虑：我们生产力还在发展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要吃饭，如果经济增长不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连就业都不能保证，更何况刚才提到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怎么去满足？生产力不能发展，所以我们谈大变局的国家、文明和全球秩序的时候，还要讲大变局的走势能不能继续下去？它的动力在什么地方？我们还能不能激发所有的动力来促使大变局一步步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走下去，这恐怕也是圆桌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

寒竹：

丁耘老师从矛盾关系来理解当下的世界与中国，我就顺着矛盾这个话题来讲。我在这里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对全球秩序或者世界发展的看法。我觉得当今世界自二战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地方化。这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冷战时期被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掩盖了。但自后冷战时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地方化这一基本矛盾日益彰显出来。

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市场体系。按照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一个很难阻挡的自然发展过程。当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走向全球化。列宁当年写《帝国主义论》时就指出，现代的垄断资本主义一大特征是资本输出。现在看来，资本输出与全球性的资源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必然现象与趋势，也许并不一定和帝国主义挂钩。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对外输出才能够解决内部的矛盾与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最大化。所以从经济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很难被阻挡的历史性趋势。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推手，因为全球化能够实现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又开始运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抵制全球化，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觉得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而西方似乎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吃亏了，于是开始搞“小院高墙”来抵制中国。国家政治是一种地方性的力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全球化重合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拥抱全球化，推动全球化；但当全球化和这个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来抵制全球化。很显然，整个美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典型。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高涨的时候，基本上西方国家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全球化。《世界是平的》一书的出版是全球化的顶峰，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抱全球化。但是当它们觉得全球化和它们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这个矛盾更深刻地讲，就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矛盾。

政治永远是地方的，是国家的，是民族的；而经济按其本性来说一定是走向世界的，走向全球化的。这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矛盾。我觉得我们要对世界的基本矛盾这个问题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只有深刻地认识了世界的基本矛盾，才能真正理解当今世界。

第二个，关于民族国家的问题。20 世纪以后，近代以来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国内学界虽然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并不完全认同，但是在很多地方也不得不使用。20 世纪的两个最大的国际组织，国联和联合国，都是使用 nation 这个概念来代表国家，而不用地域（country），也不用政府（state），来指称国家。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有民族认同的新型国家形式。这种民族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并不同于族裔认同或种族认同，因此也被称为国家认同。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自由主义多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这种基本形式受到很大挑战，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也许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率先进入发达国家有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发展，亨廷顿最早就意识到民族国家出了问题。他提出：我们是谁？谁是美国人？这个问题现在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问题的出现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自由主义推崇多元文化。但是，当全球化与多元化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动摇民族国家的根基。这个时候，还有没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国家还能不能凝聚起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都在出现这个问题。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在 2016 年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反弹。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特朗普是有可能连任的。

近年来，欧洲国家右翼的势力大为高涨，右翼势力在荷兰等好几个国家重新上台。右翼势力上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强调我的国家，而不是世界主义。最近西方国家发生的一件事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当哈马斯和以色列发生冲突的时候，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大量支持哈马斯的声音，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以前西方国家有一些学者或知识分子支持哈马斯，但是不普遍，这次很普遍，很多都是普通民众，这说明整个国家内部慢慢进入一种分裂状态，最后维系这个国家是不是还能用 nation？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还能不能维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亚洲国家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但是有一点像丁耘老师刚才讲的问题，当全球化以后，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全球化经济中培养一种异己的力量出来，这个力量可能会背离当地国家的主流，可能会不断地生长，所以说怎么在全球化的时代维持国家的凝聚力，维持国家的稳定性，这很重要。

虽然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将来民族国家会消亡，但是民族也好，国家也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许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仍然是当今世界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没有国家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如果在全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动摇，下一步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的。

丁耘：

感谢寒竹老师。寒竹老师刚才讲了两对矛盾：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地方化的矛盾；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它的凝聚和分裂的矛盾，在这点上可能我们要重新考虑 nation、政

治民族的含义。

李滨：

刚才绍光老师提到大变局的动力是什么，下一步的动力是什么。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大变局是什么样，应当从生产到生产关系来看。过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以它的生产方式统领着全球的其他生产方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实际上讲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元的生产方式，只是一种生产方式统领着其他的生产方式，叫“以太之光”。其实在过去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除了苏联搞的那种体系，其他体系只要加入世界市场，都受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影响。

现在的大变局是什么样？最重要的体现是生产力巨大发展，有两个因素：一是科技因素，二是分工。这两个东西都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的东西。第一，过去，中国的科技比较落后，到 2015 年以后，中国的科技产业规模变得比较可观。第二，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上从落后往中高端迈进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领着国际生产分工，形成了由生产分工产生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由此还形成了相应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一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中国的发展使国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动摇。这个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什么结果？西方世界不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再发展，因为这里面涉及两个矛盾。

第一，中国在生产上上升到国际生产链的中高端以后，和西方大的资本争夺利润，它们的垄断利润没了。比如，中国很多高科技产品出来以后，把它们以前垄断的东西打成了白菜价，这是一个矛盾。

第二，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后，大量的中国生产又引起了西方的就业问题。西方去工业化是为了减小生产成本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现在一旦在中国形成了巨大规模以后，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西方低端的雇佣工人、蓝领工人需求急剧减少，这造成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矛盾。

两个类型的矛盾结合导致上层的大资本利益和下层的一些工人，在一部分人的撮合下形成了反华逆流，不让中国发展。在西方反华势力看来，中国发展的很大的优势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中国的崛起是靠着新兴的国家力量，靠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它不是靠西方国家过去吹嘘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这就成为主要的制度性矛盾。

次要的矛盾在什么地方？过去西方宣扬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我们这套制度是最好的、最自然的，是历史上永恒的”，因为过去西方引领的分工，它有资格这样宣传。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基础了。在这个时候，西方就形成了对中国的挤压，不让中国发展。中国如何应对这种冲击？解决这个外部的矛盾（也包括中国内部的矛盾），还是要开放。用中国的发展促进全球的发展。

怎么开放？开放靠什么？具体怎么做？确实是非常难的题目。现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与中国）都在讲变革全球秩序。美国现在出现了两个趋向：一个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回到保护性工业国家之中，形成一种美国公开地掠夺其他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有一种是恢复传统的国际秩序，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嵌入式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中，但是

由美国领导，并排挤中国。中国倡导的变革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现在两种不同的国家对未来的全球秩序的竞争。

我认为，这代表着两种文明在较量，这个较量靠战争可能解决不了。苏联人在苏共二十大就谈到现在的战争破坏性太大，特别是如果现在中国和美国这种国家打仗对世界的破坏性更大。那如果战争解决不了靠什么？靠谁引领的新型分工更能造福世界。如果是中国式全球化，靠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造福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更多造福于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了以后，使中国能够继续有产品的市场，做到真正的共赢。中国怎么开放，怎么能做到合作共赢，这是要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书生坐而论道的，有时候是要靠实践去蹚出来的。

变革全球秩序还有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西方抹黑中国，说你这个国家要统治世界，世界倒霉了。中国人现在要向世界讲，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成功造福了全中国人民；我们继续发展，继续扩大开放，走到国际生产链的中高端，我们塑造的分工体制可能也造福于世界人民。经济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经济基础上不去，西方国家是不会把中国多当回事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抹黑中国的制度。西方国家过去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初封建贵族看不起它们。后来资本家实力上去了以后，建立自己的话语，逐步改变了他们粗俗的赚钱者的形象。今天要解决抹黑中国的问题，一方面，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要靠话语，因为仅靠物质基础没有话语权，很难做到。所以，在大变局下的世界，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西方自由制度的国家是两种最主要的、在未来可以引领或者争夺全球生产分工主导权的国家形态。中国必须塑造自己的

料”（material）问题，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市场上我们是不是沦为了人家的“耗材”，显然我们最终没有被耗材化，我们还是主人，还有自己的形式，还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主张，还始终致力于自己的民族复兴，还有日益成为全球化中心的趋势。那么，怎么会转变成这样子？殖民主义那一套为什么到了新中国就不灵了？所有这一系列矛盾中，归根结底是主体性的问题，归根结底体现为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问题。紧紧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才能理解其他一系列矛盾。

第二，回到问题本身：这个主体性的秘密在哪？怎么会变成这样，中国为什么没有买办化？是由于党的领导吗？是由于中华文明的光辉传统吗？刚刚去世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先生，他写了很多书、讲了很多话，但他对国际博弈的论述道理，无非都是基于机械力学世界观下的冲突与均势理论，这是一种 17—18 世纪的政治物理学，已不足以解释复杂有机体和复杂世界。但是基辛格有一点说得很准、很对，那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而独特”自我意识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任何朝代的领导人，从来不会屈居他人之下，总要反过来谋求自身的文明主体性。我觉得这一点他把握得很准。

但是归根结底，将主体性的秘密归结为党的领导和文明自身的传统，所指出的都只是“文”的这一面的动力。那么有没有“质”的一面的动力呢？比如，这个动力是“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本身？社会主义远大前途是历史的运动规律，浩浩荡荡，有它的硬度和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任何人的含混叙述为转移，它一定要实现。这种内在的、质的规律性要理直气壮地讲清楚。因此，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扫荡中，它的主体性的保持，不仅不是偶然的、特殊的，还因为顺应了一个更强、更硬的“质”，获得了代表着未来前途的浩浩荡荡的那种力量，只是我们因缘际会地承担了这个历史命运。因此，在所有刚才说的“一定要”的表述里面，所有“应该”的表述里面，是不是都预设了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浩浩荡荡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才具有了远大前途。

第三，这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质”的东西，通过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的先进性政治团体的自觉和领悟，通过革命的运动，重新塑造了“中国人民”，使它得以保持这种主体性。这对我们关于国家文明和全球秩序的讨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的论坛讨论了很多相关的主题，世界文明、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全球南方的未来等，探讨某种人类共同的命运、某种光明的未来的可能性等。那么可不可能应该是首先塑造一种“世界人民”呢？让这“世界人民”去担当人类未来的实现主体呢？

过去十多年，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道路、伟大复兴，但是关于“复兴”的话语预设统摄我们全社会的总体目的，其时间点竟然就在 2049 年。这是如此切近的未来想象！那么复兴之后呢？如果我们认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体性的力量，正是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的大势，那么这种大势是不是也可以塑造出世界人民呢？将来会在全世界的大团结、大联合中孕育出世界人民的主体性，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只是其中的先进部分。这样，中国人民过去的这种奋斗经验、组织优势、道路和模式，它的“质”的和“文”的动力等就不单单是历史的和地方的，而且是能激发出我们关于复兴之后的更宽广丰富的世界共同想象的。

归根结底，大家都谈到了实践论、矛盾论，实践和矛盾都是有主体性的。谁在实践，谁的矛盾？这个追问似乎是可以激发我们向着更遥远、更宽广的道路去问，而不是这个道路、这

个模式只是偶然和特殊的。这也许是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和全球秩序的一个值得注重的思想方向。

丁耘：

非常好，唐杰代表80后讲了80后对这个问题的担当。同时唐杰也是现象学家，对现象学家来说，主体和世界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主体化就是世界化，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个脱离塑造世界文明的前奏，而是在塑造世界文明中实现最新一次最伟大的复兴，这是我的理解。

圆桌讨论环节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发言人，下面由吴新文教授做会议总结。

吴新文：

2018年，张广生、丁耘和我三人在讨论创设“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的时候，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1980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那一代前辈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的大格局或总体脉络中讨论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我们意识到，受时代的限制，80年代有一个缺陷，就是只能提“文化：中国与世界”，而提不出“政治：中国与世界”。因为80年代总体的状况是，冷战中苏东社会主义阵营逐渐落于下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守势，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是“仰视”的。在中国国内，当时很多人主张向西方看齐，“融入人类文明主流”，名噪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

80年代，传统文化也开始回潮，但当时流行的儒家是以港台新儒家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即局限于修身养性层面的文化儒学、人伦儒学。很多人认为儒家是没有资格谈论政治儒学的，因为儒家在政治上已经破产，成了“游魂”，人类政治的正统或正宗在于西方的科学和自由民主。一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热衷于谈论如何从儒家的“内圣”开出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知识界的政治主流话语以西方的理论为理论、以西方的方法为方法、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而很难展开中国人自己的政治思考和筹划，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能够在2018年提出“政治：中国与世界”的主题，呼应了中国崛起的现实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中国崛起不仅在经济上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在文化上显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而且在政治上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丰富的政治内涵。政治的“统帅”和“灵魂”作用在中国发展模式中日益凸显。与此相应，进入新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政治却显得老气横秋、千疮百孔，正在陷入严重的危机。人类正在探索新的政治出路、寻找不同于西方的新的替代方案。这是我们讨论“政治：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时代背景。

本届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我们在设定这个主题时，没有在“大变局”前加上定语，希望与会者在比较大的时空尺度下把握大变局，把握不同大变局下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的关系。这个大变局可以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可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变、周秦之变、宋元之变、明清之变，探讨西方历史上的近现代之变、后冷战之变。

当然，作为论坛主办方和承办方，我们首先关注的还是当下人类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论坛年会第一场安排的四个发言者，有学者强调美西方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的形成及其威胁，有学者认为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开始崩溃瓦解，有学者从全球南方的崛起看到了新的世界体系或全球秩序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探讨了当前中美竞合的性质及其全球影响，不同观点碰撞出了很多思想火花。

在本届论坛年会主题中，“国家”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大变局中有很多国家，它们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我们最关心的国家，当然还是中国。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面貌究竟如何？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本届论坛专门设置了一场专题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具有文明型国家的很多优势和活力，但大家也看到，文明型国家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解决各种问题，面对很多挑战，目前在国家上层结构稳定的情况下，特别需要解决国家中下层结构的重建问题。

本届论坛年会主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文明”。文明也有多种，它们如何互动将对全球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本届论坛很多发言人都谈及什么是文明的问题。从与会者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对文明的一种总体理解，即文明是特定人群所具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的统一体或复合体。与城市或市民生活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观相比，中国文明观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强调活力，只有生生不息、能够不断生长出新东西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唐代的孔颖达对《周易》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解释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就是说，春天的时候，阳气上升，万物生长，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春和景明的景象，这就是文明。文明的世界是“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吐故纳新、革故鼎新的世界。

中国文明观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重视人、重视圣贤。《尚书·舜典》中有一句赞扬舜的话——“濬哲文明”，孔颖达对该“文明”的解释是：“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要有人来代表来体现的，文明要启蒙或“照亮”人，就要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精神饱满的人。文明中的杰出人物、仁人志士，决定了文明的高度。“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一诗句传达的就是孔子的文明意义。现在很多人谈文明，重视器物、制度、观念，重视各种数字，而不重视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面对当代人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全球秩序尚待形成的现实，不同的国家和文明都在思考和探索。面对这种情势，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办？很高兴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式全球化的主张。表面上看，目前经济全球化在退潮，逆全球化和地方化、小集团化的潮流在兴起。事实上，这种退潮只是意味着美西方式的全球化、建立在“中心-边缘”体系之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终结了，中国式的全球化正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会有反复，但其大趋势不可逆转。人类对经济全球化仍然有巨大需求，经济全球化的潜力并没有耗尽。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式全球化正在替代零和博弈式的美西方式全球化。

在目前新全球秩序的形成阶段，中美竞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中国毫无疑问是代表新全球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寄希望于中国，世界进步人士在看着中国。在推动新全球秩序的建构和形成过程中，中国没有逃避、推诿、扯皮的余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中国继续韬光养晦，姿态放低一点，维护美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美西方就会放过中国，中国

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就有保障。这种看法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生活于“大争之世”，逃避斗争只会节节败退，最终使局势不可收拾，国家和文明陷入危机。要进行“伟大斗争”，中国必须提高自身应对惊涛骇浪、疾风骤雨的意志和能力，随时准备粉碎敌对势力的各种挑衅和冒险。

本届论坛年会的一个重头戏是讨论毛主席。我们设置了两个专题：讨论毛泽东的思想、人格与文明底蕴；讨论毛泽东与现代中国建设。设置这两个模块，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老人家诞辰 130 周年，缅怀他的雄才大略、文采风流。通过两场讨论，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毛泽东思想中的很多东西，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用于应对中国和世界当下与未来的很多问题。当然，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不是重复他，甚至落后于他，而是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

在本届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张维为教授曾引用青年毛泽东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年会最后，我也想引用毛主席的两句诗，表达对“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的期待，对我们的国家建设、文明建设和新全球秩序建构的期望，同时也表达对在座各位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学术事业的期许。一句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另外一句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谢谢大家！

［本文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周雷整理］